

以发现其中的肯定性要素。作者指出，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影响力主要在于揭示了自近代以来启蒙运动的悖谬结局，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并未满足于单纯否定性的结论，如果结合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拯救，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乃是超越并力图拯救形而上学。在这一视野下来考察启蒙辩证法，就不会拘泥于一种纯粹否定和悲观的结论，而是要实现启蒙的内在超越，实现一种启蒙自身的启蒙。这便是启蒙辩证法中隐含的肯定性主题。张秀琴的文章是对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家 B 帕雷克关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解读进行的阐释。作者认为，B 帕雷克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一书，可以视为英语世界关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B 帕雷克从政治哲学视角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度解读，并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结构视为辩证法，而将其认识论基础视为唯物主义，但又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进行了所谓“历史的”、“社会学的”、“批判的”研究，以此强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交叉性的意义：唯心主义和辩护性思想体系。林艳梅的文章是对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现俄罗斯“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典型代表人物奥伊泽尔曼的新马克思主义观进行的研究。作者指出，在经历了前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历史性剧变之后，奥伊泽尔曼的思想观点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尤其是近年来，奥伊泽尔曼分别对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历史性检讨和重新评价，提出了一系列虽不太正统但却发人深省的观点。

美国实用主义对霍耐特的影响^{*}

王凤才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关键词：实用主义；霍耐特；承认理论；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政治伦理转向”

摘要：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霍耐特创立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最终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①对批判理论之第三期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了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并且表明了霍耐特已经融入到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例如美国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杜威的合作民主理论，对之产生了虽不直接，但却重要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 (2010) 04-0004-08

收稿日期：2009-12-29

作者简介：王凤才，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BKS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08JJD710024）、“985工程”国家创新基地项目（项目编号：08FCZD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是笔者近几年来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学界同仁所借鉴和引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在有关综述性文章中提到这个观点时不指明出处，希望以后注明。

—

霍耐特 (Axel Honneth, 1949 ~),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哈贝马斯的嫡传弟子,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 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关键人物。在霍耐特之《权力批判: 批判的社会理论反思各阶段》、《破碎的社会世界: 社会哲学文集》、《为承认而斗争: 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一体化的瓦解: 社会时代诊断的碎片》、《正义的他者: 实践哲学文集》、《不确定性的痛苦: 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再分配或承认? 哲学—政治论争》、《不可见性: 主体间性学说发展阶段》、《物化: 一个承认理论的研究》等著作中, 始终贯穿着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的阐发。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 是“批判理论重构与承认理论转向”阶段。在这一阶段, 霍耐特试图解决三个问题, 即, 其承认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关系, 阐发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 其承认理论与黑格尔承认学说及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阐发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可能性; 讨论主体间性承认形式与个人认同所遭遇的蔑视形式, 阐发蔑视体验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其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具体说来, 《权力批判: 批判的社会理论反思各阶段》(以下简称《权力批判》) 对其早期的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这就为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奠定了基础, 即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所以说, 《权力批判》意味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萌芽。从 1986 年到 1990 年的六篇文章, 尤其是《完整性与蔑视: 承认道德的基本动机》一文, 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萌芽

到基本成型过程中的重要过渡环节。^① 在一定意义上说, “承认道德”问题的提出, 意味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具雏形。如果说《权力批判》及上述几篇文章解决了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的话, 那么, 《为承认而斗争: 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就是要解决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之现实可能性,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所以说, 《为承认而斗争: 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标志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基本成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形成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 即“承认理论完善与正义理论构建”阶段。在这个阶段, 霍耐特在《正义的他者: 实践哲学文集》、《不确定性的痛苦: 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再分配或承认? 哲学—政治论争》等著作中, 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角度, 进一步修正、补充、完善了第一阶段形成的承认理论, 并试图构建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 并围绕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的关系, 阐发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构想。

概括地说,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

第一, 以蔑视与反抗关系为主题的承认理论。这是霍耐特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核心。就是说, 霍耐特在阐明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 借助于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和黑格尔的承认学说进行了重构;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承认理论。如果说承认理论是霍耐特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核心, 那么, 承认关系结构论就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核心。在承认关系结构论中, 霍耐特以蔑视与反抗关系为主题, 系统地阐发了主体间性的承认形式, 即: 使人拥有自信的爱 (情感关怀), 使人拥有自尊的法权 (法律承认), 使人感到自豪的团结 (社会尊重)。与此同时,

^① 即《福柯与阿多尔诺: 现代性批判的两种形式》(1986)、《批判理论: 从思维传统的中心到边缘》(1987)、《为承认而斗争: 关于萨特的主体间性理论》(1988)、《权力批判》“袖珍版后记”(1988)、《道德发展与社会斗争: 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社会哲学学说》(1989)、《完整性与蔑视: 承认道德的基本动机》(1990)。

他还阐发了个体认同所遭遇的蔑视形式,即:植根于虐待体验中的“强暴”(Vergewaltigung),它摧毁了个体的基本自信;植根于贬低体验中的“剥夺权利”(Entrechtung),它伤害了个体的道德自尊;植根于羞辱体验中的“侮辱”(Entwuerdigung),它剥夺了个体的自豪感。不仅如此,霍耐特还试图阐明,蔑视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尽管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论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却基本完成了两个预期目标。^[2]

第二,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众所周知,从承认理论到多元正义构想是霍耐特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如果说,霍耐特试图将规范的承认理论构想从交往行为理论进一步发展为道德一元论,使之“处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与社群主义之间”;^[3]那么,其多元正义构想则试图在康德的道德哲学、后现代伦理学与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之间进行调和。在这里,霍耐特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即:“在与弗雷泽的对立中,我认为今天从多元的社会正义构想出发是正确的”;^{[4](P209)}“社会承认关系质量应该构成为社会正义构想的立足点”;^{[4](P292)}是“社会理论命题,而非道德心理学被描述为获得社会正义规定性的关键”。^{[4](P297)}应该说,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经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但是,其多元正义构想则有待于进一步的阐发和完善。

第三,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是霍耐特实践哲学的初步构想。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视阈中,霍耐特围绕着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的关系,阐发了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构想。在此,霍耐特强调“后现代伦理学与话语伦理学基本一致”,此乃其政治伦理学构想的立足点;论证“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存在相互包容关系”,此乃其政治伦理学构想的核心;认为“承认道德介于康德传统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之间”,此乃其政治伦理学构想的定位;断言“形式伦理是人格完整

的主体间性条件”,此乃其政治伦理学构想的目标。总之,霍耐特试图在话语伦理学、后现代伦理学、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传统、社群主义伦理学、以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理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诚然,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构想还不完善,但却表明,他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乃至跻身于当代著名实践哲学家之列。

二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其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的。所谓批判理论,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指思想家们反思文明历史、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学说;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指法兰克福学派“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跨学科的视阈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为己任,因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就构成了它的思想核心。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

第一个时期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为代表,侧重于对批判理论的建构与工业文明的批判,其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确定了社会哲学的研究方向,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对否定辩证法进行了系统阐发,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单向度文明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从而使批判理论进一步系统化。

第二个时期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前期哈贝马斯^①为代表的规范研究,侧重于对批判理论的重建与现代性的批判;二是以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为代表的经验研究,侧重于对批判理论的个案研究与现实问题解决。例如,哈贝马斯对

① 关于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学界已有不同的分期,这是由于研究角度不同而引起的。在此,笔者将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分为前期和后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以前,称为前期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称为后期哈贝马斯。

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对现代性话语进行反思与批判，并试图对现代性进行重建；最为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试图为批判理论重建规范基础。

第三个时期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协商政治理论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为标志，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这里的“政治伦理转向”，主要是就研究领域、研究侧重点而言的，它意味着，此前在批判理论中的政治伦理向度至多处于边缘地位，后来它取得了核心地位。不得不承认，在早期批判理论中已经存在着政治伦理的向度，但它只是处于边缘而非核心地位。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伦理向度为社会研究所的外围人员^①所拥有；二是政治伦理向度在研究所的核心成员那里只处于边缘地位。

应该说，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是从哈贝马斯开始的。当然，尽管早期的哈贝马斯系统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的产生、结构、功能、转型等问题，并将它置于古典政治哲学曾经关注的、开阔的视野中，进行跨学科的探讨；^[5]同时，又分析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哲学、自然法权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以及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还研究了道德发展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尤其是考察了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问题。但这些研究在前期哈贝马斯的视阈中并不处于核心地位。只有后期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协商政治理论，才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话语伦理学是交往合理性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交往行为理论就是交往合理性理论）在伦理领域中的拓展，其主要理论是在《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和《话语伦理学解说》中阐发的。如果说交往合理性理论是话语伦理学的基础，那么，普遍化原则（U原

则）与话语伦理原则（D原则）就是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前者指“每个有效性规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即该规范的普遍遵守对于每个具体人的利益满足所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与附带效果，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接受”；^[6]后者指“对作为实践话语者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每个有效性规范都将会得到他们的赞同”。^{[6] (R31-132)}总之，话语伦理学是以交往合理性理论为基础的、具有认知主义特征的道德普遍主义，是以U原则与D原则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学，是具有康德先验主义色彩的形式主义义务论。哈贝马斯强调交往合理性、话语伦理普遍性和道德规范有效性，这是当代伦理学在向规范伦理学回归的过程中，自罗尔斯的《正义论》以来，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强力张扬。因此可以说，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开辟了当代伦理学研究的新视阈，从一定意义上说，实现了当代伦理学的范型转换，并成为“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的基准点。

协商政治理论，主要体现在《事实与价值：关于法权的和民主法治国家的话语理论》、^②《包容他者：政治理论研究》等文本中。对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来说，《事实与价值：关于法权的和民主法治国家的话语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法权话语理论，并试图澄清经常被人所低估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多元主义特征；二是运用话语伦理学阐发了法权话语理论的内容，并重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三是阐发话语民主理论的商谈原则，即“只有那些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之参与者都可能同意的行为规范才是有效的”，^[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越现代资产阶级形式法与当代福利国家实质法的程序主义法权模式。《包容他者：政治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一是进一步阐发对差异十分敏感的道德普

① 一般说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属于社会研究所的早期核心成员，而诺伊曼、基希海默、W·本雅明、弗洛姆等人则属于早期社会研究所外围人员。

② 关于哈贝马斯的“Faktizität und Geltung”一书，目前国内翻译成《事实与规范》或《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本人主张译为《事实与价值》。“die Geltung”这个德文词有“适用”、“有效”、“效果”、“意义”、“价值”等多种含义。所以，将它译为“规范”或“价值”各有其道理；实际上，“规范”的德文词是“der Norm”，“价值”的德文词是“der Wert”。这样看来，将“die Geltung”译为“规范”或“价值”或许都有点问题。但本人认为，就后期的哈贝马斯思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第三期发展来看，将之译为“价值”也许更可行一些。

遍主义,它“要求人与人之间都相互平等尊重。这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他性的包容”;^[8]二是在肯定罗尔斯之正义论的基础上,批评其政治自由主义,并力图将其与自己康德式的共和主义区分开来,强调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道德直觉观念;三是进一步拓展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观念,并探讨了一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承认问题;四是在阐发三种规范的民主模式(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程序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民主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完善协商政治理论。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的最终完成。如上所述,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阐发了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青年黑格尔的承认学说进行了重构,阐明了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可能性,并构建起了以承认关系结构论为核心的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并试图构建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因而可以说,霍耐特最终完成的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对批判理论的第三期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它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了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并且表明,霍耐特已经融入到了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不过,霍耐特却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是如何处理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尽管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从现实主义走向了理想主义,从一元主义走向了多元主义。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的逐步完成,既非哈贝马斯一人之力,又非霍耐特一己之功。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其他代表人物的理论,如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等,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对工业文明只是激进地批判,而没有找到摆脱文明危机的途径,没有指出通向未来文明的道路:要么在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的悲观认同中自我安慰(霍克海默),要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悲观否定中自我折磨(阿多尔诺),或者是在对未来文明的憧憬中自我陶醉(马尔库塞)。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尽管也批判现代性,但哈贝马斯对现代工业文明具有辩护和认同倾向,并试图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校正中重建后期资本主义。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霍耐特尽管还扛着批判理论的大旗,并试图重振批判理论的雄风,但实际上,霍耐特对待现代工业文明的态度已经是肯定多于否定、认同多于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已经变成隔靴搔痒了。因为霍耐特的兴趣中心乃是津津乐道于如何在现有体制内自我实现,这也是后期哈贝马斯的路数。因此,与其称霍耐特为批判理论家,倒不如称其为后批判理论家;与其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称为批判理论,倒不如称其为后批判理论。

三

笔者曾经论述过,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但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和学理证据表明,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哈贝马斯、福柯、黑格尔、米德以及泰勒等人对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9]在这些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的共同影响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得以形成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只考察美国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米德、杜威的思想对霍耐特理论的影响。

第一,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产生了间接但却重要的影响。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是在去世之后其重要思想才被发掘出来的人物,他早年受到基督教伦理与科学进步思想的双重影响。1887年,米德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由于受新黑格尔主义者罗伊斯的影响,

米德开始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同时又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在詹姆斯的影响下开始信奉实用主义。但在1889年师从狄尔泰之后不久就确立了其终生的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与德国的那些多产作家不同，米德一生只发表过几十篇论文，未曾出版过一部著作。所以，他的思想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他去世后不久，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20世纪30年代，人们根据米德生前其学生的课堂笔记以及其他的手稿编辑出版了《当代哲学》、《心灵、自我与社会》、《19世纪思想运动》、《行为哲学》等著作。从此，米德的思想学说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他也被视为20世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美国芝加哥学派实用主义的不逊于杜威的人物。就像C·W·莫里斯所说，“在许多方面，实用主义至今取得的最可靠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果，是它关于智能和心灵的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无疑是整个结构的基础。发展和阐释这一理论，便是G·H·米德毕生的任务。米德和杜威的工作在许多方面相互补充……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精确性。”^[19]

有证据表明，汉斯·约阿斯和哈贝马斯促使霍耐特关注米德的思想。

国际著名的米德研究专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1980年翻译出版了德文版《米德全集》；并出版了几部研究米德的专著，如《实践主体间性：米德著作的阐发》、《米德的思想的当代反思》等。在这些著作中，汉斯·约阿斯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主体间性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他指出，米德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主体性、自我意识进行了重新阐释，打破了反思循环，并要求在范式层面上向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转型。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承认，自己是在汉斯·约阿斯的促动下才注意到米德的思想的。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劳动与互动：评耶拿时期黑格尔的〈精神哲学〉》(1967)一文间接地促使霍耐特关注米德的思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哈贝马斯是否直接地促动霍耐特关注米德的思想，这需要费点笔墨。

笔者假定，哈贝马斯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关于米德的主体间性学说》一文，对促动霍耐特关注米德的思想起到了直接作用。这里说“假定”，是因为标志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基本成型的著作——《为承认而斗争》尽管首次出版于1992年，但霍耐特的教授资格论文却开始撰写于1985年。而收录在哈贝马斯之《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一文应该不会早于1986年。因为在该书之“前言”(1988年2月)中，哈贝马斯解释道：“本书收录了我两年来所撰写的哲学论文，编排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20]《个体化与社会化》是其中的倒数第三篇。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该文写于1987年底或1988年初。如此说来，《个体化与社会化》一文，对促动霍耐特关注米德的思想起到直接作用是可能的。因为《为承认而斗争》从开始撰写到出版的这个过程中，霍耐特有可能注意到哈贝马斯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也确实注意到了《个体化与社会化》一文。在该文中，哈贝马斯给予了米德的思想以高度评价，认为米德第一次深入考察了作为社会产物的自我的主体间性模式，抛弃了自我意识的反思模式；并根据自我对象化的主体自我关系模式，把你—我之间的对称关系，作为批判的关键。最后，哈贝马斯得出了与米德相同的结论：作为行为者，言语者要求承认他既是自主意志，又是个体的存在，这便是普遍交往行为的必要前提。这些看法，使霍耐特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概括地说，米德的思想对霍耐特理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尽管霍耐特强调规范研究，并力图使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起来，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经验研究，这固然与批判理论传统，尤其是与弗莱德堡有关，但与米德的实用主义也不无关系。二是从思想内容来看，米德有三个方面能够对霍耐特产生影响。第一是米德对社会性的强调。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是建立在社会行为主义基础之上的，强调心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霍耐特指责早期的批判理论陷入了社会性缺失的困境，他试图在社会性基础上重构批判理论。虽然这种指责未必正

确,这种重构未必可能,但至少可以说明,霍耐特与米德在思想上有共通之处。第二是米德的主我一客我关系理论。在这里,米德在社会行为主义基本立场之上,在自我与社会互动的框架中,阐述了自我的产生、自我的承认形式、自我实现等问题,尤其是分析了“主我”、“客我”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人格的形成、多重人格病理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对霍耐特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第三是米德的“普遍化的他人”范畴,以及个体自我与共同体关系的解释等,也对霍耐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霍耐特借助于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相互承认理论,使之实现了自然主义的“经验转向”。^[12]

当然,与黑格尔相比,米德对霍耐特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青年黑格尔的承认学说,就不会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但却不能够说,没有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就不会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在笔者看来,对霍耐特来说,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对青年黑格尔的承认学说进行经验自然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个手段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来说,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它只是霍耐特自己的一种选择,霍耐特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理论来改造青年黑格尔的承认学说,从而创立自己的承认理论。在2002年的《承认的理由》一文中,霍耐特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他准备“在最近几年里用其他的人类学构想来代替米德的主我概念”。^{[3] (P14)} 这是否也印证了笔者的看法呢?也就是说霍耐特运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完全是服务于自己创立承认理论的目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当初霍耐特不选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那么,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理论来改造青年黑格尔的学说;不过,一旦他选择了米德,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就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产生了虽间接但却很重要的影响。

第二,杜威的思想对霍耐特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作民主理论,二是情绪学说。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霍耐特将共和主义与程序主义视为当代民

主理论的两种规范模式,将合作民主模式视为当代民主理论的“第三条道路”。在《三种规范的民主模式》(1992)一文中,哈贝马斯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民主范式,将程序主义民主概念或者说协商政治理论视为第三种范式。在《作为反思性合作的民主:杜威与当代民主理论》(1993)一文中,霍耐特认为,当代民主理论的两种规范模式是:共和主义(体现在阿伦特的《论革命》、桑德尔的《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中)与程序主义(体现在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本哈比的《民主的合法商谈模式》中)。他通过重构杜威的民主理论得出结论:合作民主模式是当代民主理论的“第三条道路”。

在霍耐特看来,共和主义与程序主义的共同点或许在于它们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两者的差异在于:一是对民主公共领域规范原则的不同辩护方式——共和主义把民主公共领域视为政治共同体自我管理的媒介,程序主义把民主公共领域视为以合法方式合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程序。二是对国家、法权的不同理解——共和主义把法律规范理解为试图保障政治共同体自身认同的社会手段,法权是公民团结自我理解的动态表达;程序主义则把基本法权描述为民主公共领域与政治管理机构之间持续协调的保障,法权是国家承认的、道德上合法的保护民主程序的预防措施。霍耐特指出,共和主义与程序主义都是以杜威的民主理论为基础的,但如果把杜威的民主理论纳入这两种民主模式中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杜威的民主理论中,为了论证民主原则的扩大,不是趋向交往商谈模式而是趋向社会合作模式。所以说,“杜威的民主理论包含着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解的第三种选择”。^[13] 在这里,为了把杜威的民主理论重构为当代民主理论的“第三条道路”,霍耐特走出了重要的三步:一是确证青年杜威的民主理论强烈地依赖于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有着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二是论证杜威在知识论研究中逐步达到了公共领域的程序主义民主构想,在《公共领域及其问题》中达到了成熟。霍耐特试图阐明,民主意志形成的程序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合作借以解决自身

问题的合理手段。三是试图借助于合作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杜威的合作民主构想带进当代民主理论的论争中；最后想证明，成熟的杜威的民主模式不仅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比目前占支配地位的两种民主模式更加优越的选择。杜威在“超越伦理的共和主义与空洞的程序主义错误的二难选择中开辟了第三条道路”。^[13]

前面说过，霍耐特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论证蔑视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那么，蔑视体验所引起的消极情感反应功能是如何实现的？霍耐特试图借用杜威的情绪学说来阐释。我们知道，在其早期的论文中，杜威反对实用主义心理学那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人的情绪激动必须被理解为内部情绪状态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人的经验视阈里，从根本上说，情绪是人的行为意图成功或失败反冲中的情感反应，它总是积极或消极地依赖于行为过程，从而出现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霍耐特指出，杜威对“挫败经历”（Rueckschläge）的分析，为解决人的情绪行为理论构想提供了钥匙。由于主体在自身行为的挫败经历中感到羞耻，于是，就把自己体验为比以前假定的社会价值更少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王凤才.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2] 王凤才. 论霍耐特承认关系结构说 [J]. 哲学研究, 2008 (3).
- [3] 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3. S. 276.
- [4] Nancy Fraser/Axel Honneth. 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 Eine politisch-philosophische Kontrovers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3, S. 209.
- [5]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öffentli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Suhrkamp 1990. S. 51.
- [6] Jürgen Habermas.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Suhrkamp 1983. S. 131.
- [7] Jürgen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

当然，羞耻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原因，也可以追溯到他人的过错。就前者而言，主体把自己体验为低价值的存在；就后者而言，主体把自己体验为缺乏价值的存在。这就是说，规范期待行为的失望导致了交往的道德危机。所以，在羞耻这种情感反应中，蔑视体验就能够变成“为承认而斗争”的动机。那么，这个重新开启的实践是否可以采取政治抵抗的形式？社会羞耻感与伤害侮辱感是否内含政治道德潜能？这主要依赖于被伤害主体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如何构成的。因而，只有存在社会运动的表达手段，蔑视体验才能成为政治抵抗行为的动机源泉。不过，只有对产生于社会冲突的道德体验的动力学进行分析，这种集体运动的构成逻辑才能够被给予解释。于是，在阐述了主体间性承认形式以及个体认同所遭遇的蔑视形式之后，霍耐特就试图揭示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

此外，霍耐特的“法权共同体”（Rechtsgemeinschaft）概念，不仅与阿佩尔、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ideale Kommunikationsgemeinschaft）概念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与皮尔士的“研究者共同体”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chtsstaat. Frankfurt/M.; Suhrkamp 1992. S. 459.
- [8] Jürgen Habermas.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 Suhrkamp 1997. S. 51.
- [9] 王凤才.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思想渊源探析 [J]. 哲学动态, 2006 (4).
- [10] [美] G. H. 米德. 心灵、自我和社会 [M]. 赵月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11] Jürgen Habermas.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Frankfurt/M.; Suhrkamp 1988. S. 7.
- [12] Axel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 Suhrkamp 1989.
- [13] Axel Honneth.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Aufsätze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0. S. 285.

■责任编辑 / 陆继萍

ABSIRACTS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Pragmatism on Axel Honneth

WANG Feng cai

Axel Honneth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er and sociologist, and his theory of recognition and multi-justice has resulted in a "politically ethical turn" for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made some decisive contribution to its third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reveal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indicates that Honneth has entered the context of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practical philosophy. Honneth's theory has complicated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and origins, and such theories as American pragmatism, Herbert Mead's social psychology and John Dewey's democratic theory have exerted indirect but great influence on him.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Enlightenment: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ysics

XIE Yong kang HOU Zhenwu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ysics, the paper studies Horkheimer and Adorno's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in its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dialectics in order to discover its positive elements. The critique and influence of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find expression in revealing the paradoxical outcome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since the early modern times. However, Horkheimer and Adorno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mere negative conclusions, which can be proved by Adorno's criticism and saving of metaphysics in terms of negative dialectics.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of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a kind of pure negation or pessimistic conclusion but aims to achieve an inner transcendence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enlightenment, which is the positive theme in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A Study of Bhikhu Parekh's Interpretation

ZHANG Xiu qin

Professor Bhikhu Parekh is 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er and expert in Marxism. In his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Parekh give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regards its logical structure as dialectics, its epistemological basis as materialism. However, he also gives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f dialectics and materialism for emphasizing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idealism and argumentative ideolog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he "argumentation of idealism and ideology" and the materialistic basis of the "objectivity of truth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nalyzes Parekh's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Ойзерман's Neo-Marxism

LIN Yanmei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USSR and the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Теодор Ильич Ойзерман, a former academician of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flective School of Marxism", has formed quite new ideas in recent years. After his historical examination and reassess.